

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谢灼华

辛亥革命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就以图书馆事业为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资产阶级对图书馆的改革,使清末以来建立的各省省立图书馆逐步开放,并陆续举办各种公共性质的图书馆,基本上完成了省会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建设。同时,由于新图书馆学的介绍和欧美日本图书馆技术的推广,也使图书馆工作开始脱离封建藏书楼的影响,转入近代图书馆的轨道。当时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发挥,是以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面目出现的。图书馆规程的颁布,则是资产阶级图书馆立法的开端。所以,研究和探讨辛亥革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会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前因在于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直接推动和亲自掌握的图书活动。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舆论上批判改良派的同时,在组织上逐步在各地发展革命小团体。这些革命小团体在深入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秘密组织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革命团体的藏书楼和阅览室。

武昌日知会,本来是圣公会举办的公开的群众阅报所,但逐步为革命党人刘静庵等掌握,成为重要的革命团体。以后,张难先曾回忆说:“日知会者,乃科学补习所党人刘静庵独力缔造之革命机关也。”“定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灌输知识”“对阅书报者,招待极周,迎机启示。数月,会务大进,党人稍稍来归。”^①革命党人利用这个阅报室,作为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秘密活动之机关。他们印刷大量革命宣传品,当时最受欢迎的是《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书报杂志。日知会组织严密,逐步发展至新军士兵和会党、学生中。就是在遭受破坏后,其会员仍分散至各地,继续举办各种类似机关,进行革命活动,如武汉当时就有武汉阅报社等。影响及于江西等地,“胡厚斋牧师……听刘敬安在日知会演讲,大受感动,亦于返九江后设一开化阅书报室,……武昌日知会刘敬安所暗散之各种革命书籍,亦渐公布于九江。故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秘谋革命者亦日多”。^②武昌日知会的革命活动,实际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

革命派重视图书报刊之作用,倡办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图书报刊可作为革命思想灌输之工具。所以,他们注意搜集明末清初的抗清文献资料,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富有民族精神的材料,以进行反满之宣传。如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规定“庋藏古今载籍、搜罗秘要图书,分别部次,以供本会会员及会外好学之士观览。”孙孟晋在评述其藏书规定时称:“所谓‘蒐罗秘要图书’,指收集世人所秘藏的明季抗清文献资料而言,这是与它的反清宣传工作有关的特殊任务。”^③二是藏书楼和阅览室是可以利用的合法组织,表面可以流通图书,暗地里可作为秘密机关,联络党人,这也是当时处于清庭严酷的政治压迫下的

革命活动方式。如安徽安庆，1902年由潘晋华、葛温仲、陈仲甫(独秀)、何春台等创设了一所藏书楼。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陈仲甫等抵安庆，就在藏书楼公开演说，通过演讲来宣传革命思想，结合同志。所以，有人评论说：“安庆藏书楼实质上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

辛亥革命前各地革命派的图书活动，规模是不大的，且很多活动是处于秘密状态。但当时图书馆、阅览室的社会作用发挥是很充分的。一些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和图书流通密切相关，而图书流通又与革命思想的传播紧紧相连。由于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促使藏书内容和管理方法上改变当时藏书楼的“存古”传统，着力于“开新”的变革。读者对象大部分是作为革命党人的士兵、学生等，就这点上也是与封建藏书楼有区别的。所以，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图书活动，为辛亥革命后图书馆工作的变革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其影响是深远的。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政治改革和民主要求的呼声不断高涨。资产阶级所取得的短暂的政治成果，很快就被封建阶级的旧官僚、立宪派所掠夺。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却逐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出于对封建制度的强烈反抗和斗争，有感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社会各阶层人士迫切要求阅读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学说，以谋求中国社会之改造。而各地革命党人所掌握或领导的部分文化机构，也着手于封建文化之改造，因此，我国图书馆事业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建设。

我国清末各省省立公共图书馆之创办，从1904年至1911年间，先后有京师、湖南、河南、黑龙江、直隶(河北)、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图书馆之倡建和开馆。这些图书馆正式开馆，好些则在辛亥革命以后。从1912年开始，属于国家图书馆的有京师图书馆，开馆于1912年8月27日。省会公共图书馆，进行改组和开馆的，则有江南图书馆(1912年2月)、广东图书馆(1912年4月)、安徽图书馆(1912年2月)；新建的则有四川省图书馆(1911年10月)、广西图书馆(1912年)等。到民国三年左右，除少数边远地区，全国大部分行省已建立了省级公共图书馆。

辛亥革命后，作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各地通俗图书馆之建设。辛亥革命之胜利，为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当时“平民教育”的热潮甚为高涨，故各地普遍设立通俗图书馆。最早设立的通俗图书馆是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北京之京师通俗图书馆。此后，山东、直隶等省市都陆续举办通俗图书馆。截至一九一六年统计，全国有通俗图书馆239所，公共阅报处1803所，巡回文库232个。一九一五年教育部《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正是在通俗图书馆建立的热潮中颁布的。

除了省会设立公共图书馆，各地设立通俗图书馆外，市县图书馆也相继建立和发展。如江苏之无锡、苏州等地均建立图书馆。广东全省，亦有多处图书馆。

二、辛亥革命的胜利，促使我国资产阶级图书馆法规之公布。

近代我国图书馆之立法，最早为清宣统元年(1909)颁布之《图书馆通行章程》，这个图书馆法规因封建王朝之迅速覆亡而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后，我国图书馆法规在种类上已由一般法规发展到了专门法规，内容的详备和完整也大有提高了。

在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普遍建立和通俗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当时教育部分别拟定《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二月呈请大总统批准公布。统观这二种图书馆法规，其条文各为十一条，大要为图书馆宗旨、命名、审批手续等管理制度，图

书馆经费、人员、阅览规定等管理方法和征集、寄存、捐赠图书等奖励办法等各项。从其条文内容来看，已具备图书馆条例的完备性了。

《图书馆规程》第一条规定：“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阅览。各县得视地方情况设置之。”而《通俗图书馆规程》第一条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况设置之。”这里，比较明确地规定图书馆设立之宗旨，是储集各种图书或通俗图书，供公众阅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清末之图书馆法强调图书馆设立是为了“保存国粹、造就通才”是前进了一步的。

在图书馆的设立上，《图书馆规程》提倡政府兴建图书馆，也鼓励地方人士和公私学校、团体企业兴建图书馆。《通俗图书馆规程》还提出“工场”也应兴办图书馆。规程中明确规定通过行政手续的批准就可建立图书馆，承认其合法地位，这就使图书馆事业变成成为一种社会事业，对于普及图书馆和发展图书馆事业，是有相当推动作用的。

《图书馆规程》还统一了图书馆名称，实际上也使图书馆的性质更近代化了。如规定“各省及各特别区域各县所设之图书馆，称公立图书馆。公众团体及公私学校所设者，称某团体某学校附设图书馆。私人所设者称私立图书馆。”这样，结束了清末图书馆、藏书楼混称的局面，划分了图书馆系统，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此外，《图书馆规程》还规定了工作人员的配置。而为了区别图书馆服务对象的不同，公立“图书馆得酌收阅览费”，而通俗图书馆，“不得征收阅览费。”④

为了加强中等学校之管理，教育部于一九一二年公布《中学校施行规则》，亦规定在教学设备项下应有图书室之设立。此后，一九一六年，教育部通令国内出版书籍应缴送给京师图书馆一部，这是呈缴本制度的施行。又通咨各省县图书馆应注意于本地人士之著述，以保存乡土艺文，这是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之规定。以上是图书馆立法已发展到专门法令之标志。

教育部为了加强图书馆管理，职能上有所分工，关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负责，而图书馆修建事项则由教育部之总务厅分管。

三、辛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之开展。

作为近代图书馆学之介绍与研究，较早如王韬等介绍西方图书馆概况，较后如梁启超之介绍西方图书馆制度，终究未涉及图书馆管理和方法技术。廿世纪初年，当时社会人士还是着力于宣传图书馆的作用，一般还是停留在图书馆职能之介绍和图书馆设立之必要的议论上。只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图书馆学的专论才开始出现，如孙毓修在《教育杂志》连载《图书馆》一书。当时介绍的图书馆学，转译自其他文字，少量加以评述，还算不上独立的研究成果，但这还是有助于图书馆工作改革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教育的发展，作为文化教育一部分的图书馆学，逐步揉合东西方图书馆学的内容，出现于我国文化学术界。

综观辛亥革命后的图书馆学研究和介绍，首先有一九一二年《东方杂志》登载的《近代图书馆制度》，又有谢荫昌之《巡回书库普及方法议》，以1913年王懋鏊之《图书馆管理法》篇幅较大。稍后，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出版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小识》，顾实编《图书馆指南》，影响较大。由于图书馆学研究之开展，国外图书馆技术和方法介绍增多，国内图书馆管理方法上逐步舍弃传统之四部分类法，改而新编、补充、修订四部法。因新的图书增多，有些图书馆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特别是教会学校开始试用卡片式目录。改革虽然是缓慢的，研究也是相当落后的，但应该承认，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还是开

展起来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虽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封建顽固派的反扑，革命很快流于失败，中国又走上了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我国一度有所发展的图书馆事业，因管理不善，经费无着，馆舍狭窄，委任失人，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部份图书馆变为粉饰太平的机构。下面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几个地区的情况。

天津图书馆，“该馆择地甚佳，器具亦新，新旧书籍亦多可观，惟管理太形废弛，殊足可惜。”^⑤

广东图书馆，“……惟其宗旨在存古，不在通俗，该馆职员多系从前老师宿儒，……查所藏图书颇多，以旧书为大宗，新译书次之，图志外国书全无。”“现在阅览人数，每月平均约近三百人，阅览书籍以新学书为最多。”^⑥

江苏省图书馆，“规模宏阔，储藏甚富，兼多善本。惟新出之书未能旁搜博采，美犹有憾。”^⑦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各地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藏书内容和内部管理工作水平等方面，都是比较落后的。这些情况，在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内是比较普遍的。

本来，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有较大发展，但是，事实确乎出人意料之外，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政局的不稳定、社会经济的凋蔽和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比较有力的改革等原因外，就图书馆事业本身而论，一方面是领导机构的软弱无力，既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措施，同时，官僚机构的腐朽作风，把图书馆当作清代遗老养闲休息之地，这当然是办不好图书馆的。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建设起一支图书馆专业干部的队伍，所以，当时图书馆工作和技术不能作较大的改革和变动。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进入到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事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我国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影响下的进步图书馆活动，苏区、解放区的图书馆事业，组成了现代革命文化一部分的新图书馆事业。这种新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训练和培养了我我国图书馆的干部，发展了我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些图书馆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图书馆事业，无论从图书馆性质、图书馆工作内容、图书馆读者对象以及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也说明，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支持，人民的力量和要求，我国图书馆事业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注释：

① 张难先：《日知会始末》。

② 曹亚伯：《武昌日知会之破案》。

③ 孙孟晋：《清末东南的几个藏书楼》。

④ 《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均见《东方杂志》第12卷第12期，1915年。

⑤ 《视察第一区（直、奉、吉、黑）学务总报告（直隶部份）》，1913年，载《教育公报》第一册。

⑥ 《视察第七区（闽、粤、桂）学务总报告（广东部分）》，1914年，载《教育公报》第三册。

⑦ 《视察第三区（皖、苏、浙）学务总报告（江苏部分）》，1914年，载《教育公报》第三册。